马援的悲剧与汉光武

祝总斌

内容提要 马援一生，功勋卓著，忠心耿耿，然而在晚年讨伐武陵蛮夷之战中，却遭到监视、掣肘以至谴责，死后尸骨未寒即被迫追收新息侯印，妻子也草索相连，诣阙待罪。表面看来，象谗人陷害，实际上功高震主，是汉光武出于猜忌心理而一手造成的。马援的悲剧在于，他自以为力图战死边疆，"马革裹尸"，是为了报答汉光武的知遇之恩，谁知这个良好愿望和豪迈行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却产生相反效果，自己也落得一个悽惨的下场。文章对汉光武的刚愎自用、拒谏、猜忌心理均有具体分析。

关键词 功勋 忠心耿耿 武陵蛮 监视 谴责 猜忌 刚愎自用 拒谏

《后汉书·马武传》："（光武）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列侯，而太官无余。……故皆保其福禄，终无诛谴者。"但有一个例外，这就是马援。史称马援早年投靠汉光武，二十年中立功累累，爵封新息侯，食邑三千户，富贵已极；然而晚年于率军出征武陵蛮夷中，竟遭监视、掣肘、谴责，死后还被追收新息侯印绶，连尸骨也未能归葬旧茔。

据此，王夫之说："光武之于功臣，恩至渥也，位以崇，身以安，名以不损，而独于马援寡恩焉，……"①。其故安在？是马援罪有应得吗？否！

试看加给马援的罪名。

第一，《后汉书·马援传》②：建武二十五年，马援以伏波将军身份率军讨伐武陵蛮夷，军至下隽，"有两道可入"。一道"路近而水嶮"，另一道"途夷而运远"。马援主经近道，部将耿舒主走远道。两个方案报到洛阳，"帝从援策"。但后来进军近道受到激烈抵抗，难以通过，士卒与马援俱病。耿舒给洛阳兄耿弇书曰："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章怀注：言似贾胡，所至之处，辄停留），以是失利"。弇得书即上奏。光武派虎贲中郎梁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梁松与马援有积怨，逢援病死，"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所谓"因事陷之"，史无明文，未知何事，但似乎未超出耿舒贾胡之讥，即进军迟缓范围。所以后来马援同郡人朱勃上书为援鸣冤，称"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光武未予否认。如果梁松所陷之"事"确有新内容，则以汉光武之为人（见下），对朱勃是不会置之不理的。

第二，马援，在这以前"南击交阯"之时，常吃薏苡（一种草本植物）以防病，旋军时载以一车，欲以为种，移植中原。及援病卒受谴，有人上书揭发，以为车上所载皆明珠文犀，功臣马武等也证成其事，"帝益怒援"，吓得马援"妻孥惶惧"，不敢归葬援尸于旧茔，不得不诣阙请罪。

以上罪名十分可疑。

首先，汉光武素以对功臣宽厚著称，何以竟以贾胡之讥、明珠之谮为立功累累之马援

罪？进军之道经光武自己批准，原有利有弊，路近为利，水险为弊；水险又遭激烈抵抗，自需谨慎。故贾胡之讥即便属实，也与战争失利大不相同。当年虽失师失地仍蒙宽宥之功臣非止一人③，为何今日马援只不过进军迟缓，待遇却如此苛刻？至于明珠之谮，更加奇怪。一车赃物，万里迢迢由交阯运至洛阳，何能尽掩人耳目，一查便知分晓。可是汉光武对马援虽因此"益怒"，而又不下令核实，可说是引而不发，是何道理？

其次，梁松乃汉光武女婿，曾因捲入马援所批评的事件中，受光武谴责，"叩头流血，而得不罪"，对援不能无憾，为光武所知④；后又以不得马援礼遇，加深嫌隙。既然如此，为何在这关键时刻要派梁松去责问马援，并代监军，彻查其事？难道不怕梁松借机报复、诬陷？

以上疑点都可以汉光武晚年猜忌马援的角度找到答案。这种猜忌，并没有史料直接记载，但蛛丝马迹决不能忽视。

2

如所周知，鉴于王莽篡位教训，汉光武一生"总揽权纲"⑤，"政不任下"⑥，对大将、大臣很不放手，实质上也就是猜忌，只不过因为在矛盾的处理上十分高明，后人评价他时往往不强调这一点。可我们现在要具体探讨马援悲剧的由来，就无法绕开这个问题。

早在全国统一之前，汉光武猜忌已不乏其例。

《后汉书·寇恂传》：出身上谷郡"著姓"，投汉光武。后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镇守后方。汉光武在前方征讨，"数策书劳问"。董崇说寇恂曰：当年萧何留守关中，汉高祖有怀疑之心，也是从前方多次派人劳问萧何。今"君侯……内得人心，外破苏茂（更始帝之将），威震邻敌，功名发闻，……"，当以萧何为"镜戒"。寇恂"然其言，称疾不视事"。后派兄子寇张，姊子谷崇诣光武，实际上是作人质，"帝善之"，怀疑才未发展。

《后汉书·耿弇传》：出身右扶风大族，投汉光武。父况任上谷太守。弇率兵征讨在外，屡立功，升建威大将军。"弇以父据上谷，……又兄弟无在京师者，自疑不敢独进（指继续征讨），上书求诣洛阳。"耿况"闻弇求征，亦不自安"，乃遣子耿国"入侍"，实际上也是作人质，"帝善之"。表面上没有对寇恂那样"数策书劳问"，但从"帝善之"，即对送人质赞赏推测，恐怕汉光武还是通过其他渠道暗示了这一意图的。

《后汉书·冯异传》：异为汉光武征西大将军，率军西讨，屡立战功。约在耿弇求诣洛阳后不久，"异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书思慕阙廷，愿亲帷幄"。冯异曾任汉光武的主簿，关系亲密，相互了解，这无疑也是深知光武猜忌心理，而采用的表白自己毫无异志的一种手段。由于冯异曾"与诸将定议，上尊号"，大力促成光武登上皇帝宝座，本人又素来"谦退不伐"，光武对他猜忌较轻，所以并未同意他的申请，甚至也未通过暗示责以质任。不过后来有人上章告异"专制关中，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汉光武又有所疑虑，于是派使臣"以章示异"，表面上是表示信任，实际上是进行试探，兼施压力。幸亏冯异处理得很好，立即上书谢罪，特别是宣称自己一切战功，全靠汉光武英明指挥方才取得，暗示决不可能也没有胆量背叛，光武这才放心。

全国统一以后，汉光武的猜忌并未改变，他害怕大将拥有重兵的一个最有力证据，就是立即通过暗示，促使邓禹、贾复、耿弇三位大将自动辞职，交出兵权，"以列侯就第，……阖门养威重"⑦。随后，另一大将朱祐也"上大将军印绶"⑧。这样，东汉初年的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中地位、声望最高的前十位⑨，除了吴汉，以及统一前已死的寇恂、岑彭、冯异、祭遵、景丹外，全都被罢除了兵权。防守边地所需军队，只交给名次排在后面、地位、声望较低的

将军如马成、王霸等掌握。这决非偶然巧合，而是汉光武经过深思熟虑所采取的措施，和他统一前猜忌大将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

至于吴汉，在云台二十八将中位居第二，地位、声望俱极高，其所以继续握有兵权，原因有二：

第一，全国统一后，防御北方匈奴，镇压内地一些规模较大叛乱，还需要具有杰出军事才干的大将统兵出征，无法全都罢除兵权。而据《后汉书·吴汉传》，“其人勇鸷，有智谋，诸将鲜能及者”，正符合需要。

第二，然而和同样具有杰出军事才干的邓禹等人比起来，吴汉又有突出的地方。除出身低微外⑩，这就是“性忠厚，笃于事上。自初从征伐，常在左右，上未安，则侧足屏息，上安，然后退舍”。“当出师，朝受诏，夕即引道，初无办严（装）之日”。一句话，十分恭顺谨慎，“故能常任职，以功名终”⑪。

这样，与罢除兵权的诸大将比，吴汉成为一个例外。

然而即便如此，猜忌仍或隐或现地威胁着吴汉。史称“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⑫。当年萧何由于遭到刘邦猜忌，故意用贱价强买民田，以表示自己没有政治野心⑬，吴汉妻子是不是也听到什么风声：怀疑吴汉重兵在握，不很可靠，所以要仿效萧何，剖白自己呢？很有可能。不然，早不买，晚不买，为什么偏偏要在吴汉率军出征中急急忙忙买田宅？当然，吴汉又把田宅分给了别人，但这并不等于原来不存在猜忌。或许吴汉别有考虑，以为凭恭顺谨慎便可保全富贵，仿效萧何多买田宅，反而会过于露骨地暴露对光武帝的戒心，加深君臣隔阂，于己不利？关于吴汉想以恭顺谨慎对付汉光武的猜忌，还可举出一个证据，这便是建武十八年平定史歆等叛乱凯旋京师后，他立即象当年邓禹等一样，交出军权，并且再也不揽新的出征任务。这事《后汉书》、《后汉纪》虽然不载，但《艺文类聚》卷四七引后汉杜笃《大司马吴汉诔》赞他：“……勋业既崇，持盈守虚；功成即退，挹而损诸”。据《东观汉记》，杜笃本因罪入狱，“为诔，辞最高，（光武）帝美之，赐帛，免刑”⑭，可证所诔与事实不会有多大出入。而所谓“持盈守虚”、“功成即退，挹而损诸”，以建武十八年凯旋到二十年病死近两年光景，吴汉在政治、军事舞台上未再出头露面推测，不是指交出兵权，“阖门养威重”，又是什么呢！当时为吴汉作诔者并非一人，估计一般都会歌颂他的功勋和所辅佐的光武帝的圣明，其所以杜笃之诔被极力推崇，很可能就因为比其他的诔多了“功成即退”一类话，汉光武看中了，要以此在功臣中宣扬这种思想吧！

由此可见，吴汉是又例外，又不例外。和其他诸大将比，在受猜忌上，并不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不但从龙功臣，即便归顺较晚，情况与马援某些方面类似的窦融，也清楚光武的猜忌心理。据《后汉书》本传，他出身名门大族，王莽末年割据河西，归顺光武帝后因功封侯，官凉州牧，仍十分谨慎，“以……久专方面，惧不自安，数上书求代”。及征至京师为大司空，“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数辞让爵位，……帝不许”。然而也因此故，至死恩宠不衰。故范晔评说：窦融本“徼功趣势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满，至乃放远权宠，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

总之，凡位高望重之大臣，谁恭顺谨慎，谁不揽权，特别是不揽军权，谁就可以少遭猜忌，保全富贵。

马援怎样？

3

马援并非从龙功臣，本事隗嚣，建武五年方投奔汉光武。可是他不但出身名门大族，三个兄长王莽世皆位二千石，封侯；而且为人“慷慨多大志”，“明须发，眉目如画，闲于进对，尤善述前世行事，……自皇太子、诸王侍闻者莫不属耳忘倦”，亦即有大志，有仪容，有口才，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马援还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善兵策”。如所周知，汉光武对自己的军事才能极为自负，大将出征，“皆授以方略，使奉图而进”⑮；而且身在洛阳，对战局发展皆临时颁发诏敕，实行遥控，见《后汉书》吴汉、岑彭、冯异各传。然而连他也不得不承认：“伏波论兵，与我意合”，“每有所谋，未尝不用”。这种殊荣，在群臣中仅此一见。

马援以上特点、长处，在一定条件下，即马援抛弃隗嚣，投奔光武，“孤立群贵之间，傍无一言之佐”⑯，不可能对皇权构成任何威胁时，汉光武决不会挂意。而且其所以从讨隗嚣开始，汉光武日益信任、重用马援，甚至超过从龙功臣⑰，除了军事才干外，恐怕正是看中了他的“孤立”和无助。这应是汉光武驾驭大将、功臣的一种策略。

但是到建武二十年以后，情况已经发生变化：

1.马援地位、声望大大提高，和当年的邓禹等相去已不甚远，特别是征交阯，斩征侧、征贰，爵至新息候，“吏士皆伏称万岁”。按《后汉书·韩稜传》，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据此清代赵翼说：“则汉时（万岁）已属至尊之专称矣。”⑱虽然当时限制还不严格，但吏士欢呼，毕竟反映马援甚得军心。

2.汉光武统治仍不稳固。西汉末全国人口五千九百多万，经过战乱，大量减少，东汉初恢复极慢，到光武末年也才只达两千一百万⑲。所以当群臣建议封禅泰山时，汉光武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⑳

由于此故，汉光武常怕内部发生变乱。《后汉书·臧宫传》：上书请伐匈奴，汉光武“诏报曰：……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㉑。此诏虽发布于马援死后两年，但这种看法，他早已有之。所谓“国无善政”，主要指社会经济恢复没有搞好，与稍后所说“百姓怨气满腹”是一致的，其可能导致的后果便是：祸起萧墙。对此，汉光武长期为之忧虑，而且时间越靠前，经济恢复越差，他的忧虑应该也越大。至于“灾变不息”，据《后汉书·五行志》，也是臧宫上书前五、六年间比较突出。即建武二十二年五月“日有蚀之”；同年九月发生汉光武即位后最大一次地震：“郡国四十二地震，南阳尤甚，地裂压杀人……”；二十四年六月“沛国睢水逆流……”；二十五年三月戊申“日有蚀之”。我们知道，汉光武极迷信天人感应说与谶纬㉒。上述灾变中，南阳是汉光武家乡，而地震最重，他不能不疑虑、惊心，所以立即下诏表示“咎在君上”，并免除南阳郡当年田租等㉓，以求缓和各种矛盾。另外，沛国是汉高祖家乡，河水逆流也不吉利㉔。特别是建武二十五年三月戊申的日蚀，据《春秋纬》中“潜潭巴”篇预言：“戊申蚀，地动摇，侵兵强；一曰：主兵弱，诸侯强”。“侵兵”意味着什么，“诸侯”指谁，按照解释纬书惯例，都要在东汉社会寻找比附，这同样不能不使深以王莽篡位为鉴戒的汉光武，要对手下的大将怀疑、猜忌㉕。由此可以推定，汉光武诏报臧宫虽在建武二十七年，但诏书中所反映关于祸起萧墙的担心，按理说，在“灾变”更突出的前几年，只会更强烈。那么在这前几年中谁有资格成为汉光武怀疑、猜忌的主要对象呢？就是马援，也只有马援。除了前述家世、仪容、学识、军事才干及威望、地位不断提高等因素外，最重要原因还在于：马

援不但不肯象当年邓禹、贾复、吴汉等功臣那样“功成即退”，相反，不断请求握兵出征。情况是这样的：建武二十年马援从交阯得胜归来，因爵封新息候，食邑三千户，对汉光武感激涕零，便对谋士孟冀求策曰：“今我微劳，猥飨大县，功薄赏厚，何以能长久乎？先生奚用相济？”孟冀不能对。马援自作聪明地说：要想长久固宠，办法就是不断请求出击匈奴、乌桓，“马革裹尸”，以显示自己的无限忠心，“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谁知，与马援的主观愿望相反，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恰恰进一步遭到忌讳。一个具有种种优越条件，特别是军事才干杰出，而功名又已提高到使吏士伏称万岁的大将，再掌握了重兵，将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联系“国无善政，灾变不息”，汉光武怎么能够还坦然处之，而不疑虑重重？马援的悲剧，正种因于此。

如果以上臆测不错，则汉光武后来在这一方面的一系列行为，对马援的“寡恩”，也就不难得到解释：

1.建武二十年冬，匈奴、乌桓寇扶风，与历次命将由汉光武主动任命马援不同，这次是马援主动“请行”，光武批准。而到建武二十四年由于武陵蛮夷造反，武威将军刘尚全军覆没，马援“因复请行”时，汉光武拦阻了，“愍其老（援时六十二岁），未许之”。马援“自请曰：臣尚能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但可悲的是：与马援愿望相反，越显得身体结实，也就越有可能遭受猜忌。有力的证明便是：汉光武在批准马援请求的同时，又委派马武、耿舒等大将随同出征。这两人都与马援不睦。马武后来两次诬陷马援。至于耿舒，马援在出征前便厌恶地对友人杜愔说：自己决心为国捐躯，“但畏长者家儿，或在（光武）左右，或与从事，殊难得调，介介独恶是耳”。章怀注“长者家儿，谓权要子弟”。《资治通鉴》卷四四胡注更具体：“或在左右”指梁松、窦固（二人都在汉光武前说马援坏话㉖）；“或难共事”指耿舒。然而偏偏是马武、耿舒被委任为马援的主要部将，难道这能是偶然的巧合吗？不可能。从任命刚下，马援立即发出与耿舒共事“殊难得调”的忧虑，也可知道二人嫌隙决非始于这时，正象马援与梁松嫌隙由来已久一样，汉光武不可能不清楚。所以马武、耿舒之所以被安插在马援身边，实际上是汉光武的权术：利用矛盾，对马援进行监视、牵制。军至下隽，在区区进军路线上耿舒一持异议，马援作为主帅便无权决定，要向数千里外的汉光武请示；而耿舒所给其兄耿弇书信，一到洛阳，随即上奏，这些现象都不应等闲视之，全都是有机联系的。

2.汉光武对马援，思想上也存在矛盾。因为征讨武陵蛮夷的主帅人选，当时已没有人比马援更合适㉗。如从战争胜利着想，又不能不用他。这就是为什么汉光武尽管对马援有猜忌之心，终于又未拒绝遣他出征的原因。当时汉光武的算盘应该是：在安插有马武、耿舒监视、牵制的条件下，充分利用马援军事才干，迅速平定叛乱。他之所以在马援与耿舒不同进军路线中“从援策”，就是为了希望能早日结束战争，以免马援长期掌握重兵，夜长梦多。谁知事与愿违，进军受阻，而耿舒来信却说马援“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似乎是在有意拖长战争时间，这怎能不使汉光武又气又急，联系连年天变，特别是不久前三月戊申的日蚀，要怀疑马援不肯全力平叛，而是拥兵自重，别有企图呢！他之所以要急急忙忙派梁松对马援“驿责”，而顾不得考虑进军路线乃自己批准，“路近而水嶮”，应该谨慎行事等因素，内心奥秘当在于此。后来朱勃上书为马援鸣冤，自称“窃感栾布哭彭越之义”，从中透露，时人逐渐也看出汉光武是在用类似处理谋反案子的态度，对待马援了。

3.汉光武所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的人，恰好是女婿梁松，也决非偶然。除女婿

可靠性大这一因素外，还因为梁松与马援有隙，必然会认真、仔细地收集材料，从而有利于搞清马援问题的性质，以释心中疑虑。当时汉光武最怕的不是梁松借机报复、诬陷，而是在马援的影响、控制下，了解不到真实情况。所以不但派梁松驿责，而且命他“因代监军”。关于“因代监军”，还需略加考证。第一，按《后汉书·宋（宗）均传》，原来的监军本是宗均。他以谒者官位发兵援救被武陵蛮包围的武威将军刘尚过程中，因刘尚全军覆没，后来便就地委为马援的监军。因为不是随大军从洛阳一起来的，并不了解汉光武对马援的微妙态度；加之“性宽和，不喜文法”，估计一直没有向洛阳驿送有价值的情报。在马援病死后，他以儒书公羊传为指导，矫制招降蛮夷，全部平息了反抗。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大功。可是这是梁松驿责未到以前的事，汉光武派出梁松之时并不知道。相反，和耿舒的书信比较，汉光武大概认为宗均没有尽责，甚至或许还怀疑他与马援有勾结，所以要特命梁松代他监军。第二，及至梁松到达，宣布诏书，代宗均监军后，方才了解到他的平蛮功绩，当迅速向洛阳发了报告[28]，这时宗均已经北返（很可能诏令规定他受代后立即北返）。[29]史称“光武嘉其功，迎赐以金帛，令过家上冢”。《资治通鉴》卷四四胡注：“受命而出，未复命则不当先过家。今使过家上冢，所以示宠荣也”。这表明宗均北返之初当为撤职甚或待罪之人，汉光武得悉平叛功绩，觉得原来处理不妥，为了迅速表示抚慰，不等他回到洛阳，就派出使者迎上去颁以宠赐之诏。可见，一个“迎”字体现着汉光武的复杂思想变化过程。第三，然而在梁松彻底调查马援材料之前，汉光武对宗均仍未消除疑虑，所以尽管立功极大，竟然仅仅赐以金帛和给予“过家上冢”的虚宠，官位一点没动，这很不合乎常规，除了与马援之事联系，很难加以解释。总之，通过对宗均的态度，反映汉光武命梁松“因代监军”含有深意，决非为了处理一般进军迟缓的问题。

4.值得注意的是：汉光武派出梁松驿责等，似乎只表示了对马援的不满，而没有透露内心深层次关于祸起萧墙之虑，所以梁松等也没有从这方面迎合。这正是汉光武的高明之处。因为他懂得：只要有了不满的表示，与马援有隙的这批人，自会周密调查，如果马援真有不轨行为，是决不会漏掉的。结果经过这批人一再罗织，以及一些赶浪头人的揭发，最后证实：怀疑马援有不轨行为，纯属自己过虑；而且他可责之处也有限，后来冒出来的明珠之谮，对功臣来说，并非重要问题[30]，所以汉光武并不追查。在驿责，收侯印，发了一通脾气之后，就将此事丢在一边。当朱勃为马援鸣冤时，汉光武火气已过，只因向来自以为高明，特别是君道尊严的传统，故“书奏不报”，不肯为马援平反；但另一面对朱勃的愤激之词“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甚至引用诗经“取彼谗人，投畀豺虎”云云，也均容忍。而且据《后汉纪》卷八记载，汉光武还曾召见迎合自己意志，罗织马援罪名的梁松、窦固，“以（朱勃）所上章使读之，松、固惊相谓曰：如是，陛下不甚罪伏波也”。不久，马援妻子全家“特获恩全”；宗均也迁上蔡令，升九江太守[31]。可见，汉光武虽未能做到知错即改，但也不再继续扩大错误，在封建帝王之中，也算难得的了。

对于这桩公案，明代王夫之评说：这是马援咎由自取，因为他的“马革裹尸”实质是他“好战乐杀”，“贪俘获之利”，想“役人之兵以逞其志”，故“为光武所厌”，最后落一个悲剧下场[32]。这种评论当然极不公平，十分武断[33]。但它也说明，在王夫之心中，马援得罪真正原因并不是贾胡之讥、明珠之谮，而是汉光武早已厌恶他，于是以此为借口，予以追究、打击。这一点与我前面的分析、看法，有一致之处，尽管仅着眼于光武厌恶马援贪利，是远不符合事实的。

晋人袁宏是另一种评说。他以为“善为功者”要适可而止，不要贪图无厌，以免遭人妒忌、“怨谤”，而马援于“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犹复垂白据鞍慷慨(继续贪图功名)，不亦过乎”[34]。这种评论也不准确。因为事实是梁松等之所以要陷害马援，并非妒功，而是察言观色，为了迎合汉光武意志[35]。所以当朱勃气愤地指出“谗人”时，汉光武不予理睬，只不过召见“谗人”梁松、窦固，暗示以后不要再提马援之罪，所谓“松、固惊相谓曰：如是，陛下不甚罪伏波也”，正反映这一事实。汉光武明明知道他们诬陷，仅仅轻描淡写地责备两句，实际上是加以保护，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心中明白：他们的进谗，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可见，袁宏之说亦未能探本。不过他把“垂白据鞍慷慨”视为马援得罪之起源，而不就事论事，仅从贾胡之讥等着眼，又能给人以启发。

宋代还有人认为，对马援刻薄寡恩，是因为汉光武老糊涂了[36]，这也不对。如前所考，汉光武在处理马援问题上，可以说是运筹庙堂，深思熟虑。为了取得平定武陵蛮夷战争的胜利，他不能不许马援掌握兵权；同时又精心策划，监督、限制马援行使权力，后来又有意给予马援以打击，目的就是防止祸起萧墙。这和他统一全国前后对待大将的指导思想，完全一致。他是清醒得很，一点也不老糊涂。只是由于不适当地吸取王莽篡位教训，迷信“灾变”，猜疑太甚，草木皆兵，这个错误终于在马援问题上集中暴露出来罢了[37]。不过宋人这一看法也有可取之处，这就是与后来的王夫之完全相反，认为马援得罪，其责任全在汉光武，尽管归之老糊涂的见解不对。

以上诸看法，和我的臆说不同，但都可从不同角度证成我的臆说，所以不嫌烦琐，予以援引，并略加分析如上。

总之，马援的悲剧，错全在汉光武，而且错得很厉害。所幸他善于“柔道”[38]，一开始便对马援妻子家属留有余地，后来方得偃旗息鼓，不了了之，在这一点上，又可算差堪人意的。

最后，谈点对马援的看法。

马援本是个极聪明的人，对汉光武的秉性也并非毫无了解。早在出兵交阯之时，便曾万里还书，告诫洛阳的侄子马严、马敦，反对他们“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章怀注：谓讥刺时政也）”，并为后世提供了两句成语：“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狗”。为什么要“万里还书”，如此迫不及待呢？当是基于对汉光武秉性之了解。《太平御览》卷九十引袁山松《后汉书》，称赞汉光武“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其实，光武度量不能说很窄，也绝对谈不上大度。特别是即位为帝和统一全国之后，他十分自以为是，对直谏往往不能容忍：

《后汉书·侯霸传》：大司徒韩歆，“好直语，无隐讳，帝每不能容”。有一次，韩歆“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坐免归田里”。按天人感应说，岁将饥凶表明天子功德有亏，所以史称“帝犹不怿，复遣使宣诏责之，……歆及子婴竟自杀”。司马光把这视为光武帝“仁明之累”[39]。其实，汉光武拒谏，打击言者之事又岂止这一件呢！

《后汉书·桓谭传》：汉光武信谶，力图用谶巩固威信，谭屡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由议郎出为六安郡丞，道病卒。叶适评说：桓谭直谏，光武“摧折之致死，可谓褊（心胸狭窄）而严矣”[40]。

《后汉书·鲍永传》：为司隶校尉，替韩歆求情，“固请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为东海相”。

《后汉书·申屠刚传》：为尚书令，“每辄极谏，……帝并不纳，以数切谏失旨，出为平阴令”。

《后汉纪》卷六建武七年：汉光武欲用谶决定郊祀事，以问太中大夫郑兴，“兴对曰：臣不为谶。上怒曰：卿不言谶，非之邪？”眼看桓谭的命运就要落到郑兴头上。幸亏他比较圆滑，答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敢非”。“上乃解，曰：言不当若是邪！”意思是：说话要婉转，要给他留面子。

对于汉光武这个毛病，马援很清楚，所以一生从未直谏。建武十六年因度田不实，汉光武处死了十几个刺史、太守。不久，“上从容问…… 马援曰：‘吾甚恨前杀牧守多也。’援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复生。’上大笑”。这是何等巧妙的回答！既给汉光武留了面子，又对他杀人太多作了劝谏。怪不得袁宏在《后汉纪》卷七记载此事后要说：“其顺时不忤，皆此类也”。职此之故，当马援听到侄子好讥切时政后便万分焦虑，不惜万里还书告诫。在他看来，只有象龙伯高那样，“敦厚周慎，口无择言”⑪，埋头苦干，马革裹尸，方可免遭谴责，保全功名。殊不知讥切时政，直谏固然危险，作为名门大族和威望日高的将军、列侯，又处在社会矛盾甚多，“灾变不息”之时，再拥兵万里，功高震主，则会招来更大猜忌。当年邓禹、贾复、耿弇、吴汉，以至窦融都懂得这个道理，为什么聪明绝顶的马援反而糊涂了呢？或许他以为自己全靠汉光武一手提拔而飞黄腾达，与当年曾和汉光武平起平坐的功臣，以及挟河西大片土地投顺、身份特殊的窦融情况不同，汉光武猜忌名单上不会把他列上的缘故吧！不管怎样，事实是一片耿耿忠心，换来的竟是一场暴风骤雨。这个悲剧的下场恐怕是马援始料所不及的。古来君臣关系相处甚难，于兹又添了一个新的范例。

注：①《读通鉴论》卷六，后汉光武第三十四条。

②以下除另行出注者外，引文均出此传。

③如《后汉书·邓禹传》：违反汉光武迅速进军长安的敕令，部将背叛，连连败北；又如同上《吴汉传》：包围隗嚣，粮少，舍不得罢遣一部分士兵，逃亡者增多，沮丧军心，失利。汉光武都未深责。

④参《后汉书·马援传》王先谦集解引“王补曰”。

⑤《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⑥《后汉书·仲长统传》。

⑦《后汉书·贾复传》。

⑧《后汉书·朱祐（祜）传》。

⑨参《后汉书·马武传》后“论曰”。

⑩据《后汉书》本传，“家贫，给事县，为亭长”，出身低微可知。

⑪以上俱见《东观汉记》吴树平校注本334—335页。

⑫《后汉书》本传。

⑬《汉书·萧何传》。

⑭同⑪810页。

⑮薛莹《后汉记》，见《太平御览》卷九十。

⑯此朱勃为马援伸冤之语。建武六年马援上书光武也自称：“奉事陛下，本无公辅一言之荐、左右为容之助”。俱见《后汉书》本传。

⑰据《后汉书》各传，建武十三、四年（公元37—38年）诸功臣罢兵权时，年龄都比马援小得多。邓禹于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二四，则至建武十三年年三八。贾复于建武元年妻方孕，如假定年二五，则建武十三年年亦三八。耿弇于更始元年（公元23年）年二一，则建武十三年年三六。朱祐于王莽世“初学长安”，与光武交往而“先升讲舍”，如略长于光武，则建武十四年年四五（是年光武年四四）。然而与诸大将罢兵权不同，建武十三年马援已五一岁，仍

迭受重用。建武十七年五十五岁时更奉命镇压皖城李广暴动，年底又官伏波将军，率大军出征交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扶乐侯刘隆仅为其副手，吴汉更赋闲在京师（翌年初蜀地史歆反，无人可遣，吴汉方被命往讨）。马援之显赫，至此以极。

⑱《陔余丛考》卷二一“万岁”。

⑲《后汉书·郡国志五》刘注引伏无忌所记。

⑳《资治通鉴》卷四四建武三十年。

㉑孔子原话下面还有一句：“而在萧墙之内也。”萧墙之内，宫室之内。此处泛指内部。见《论语·季氏》。

㉒他曾公开“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在古代君主中极少见。又参《后汉书》桓谭传、郑兴传。

㉓参《后汉书·光武帝纪》。

㉔《汉书·五行志下之上》：武帝元延三年，蜀郡“江水逆流”，加上岷山崩，刘向以为“汉家本起于蜀汉，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殆必亡矣”，“其后……王莽篡位”。

㉕《后汉书·五行志六》以为这次日蚀是预示武陵蛮夷反抗，实误。日蚀在建武二十五年三月，而反抗于二十三年已开始，二十四年派出马援镇压，均在日蚀之前。

㉖参《后汉书·皇后纪上》。

㉗云台二十八将，除去死掉，以及早已解职，不与征战者外，当时凡在职者，全都不是帅才。参《后汉书》臧宫、马武、刘隆、马成、坚镡、王霸各传。刘尚军没后，汉光武本命马成率军讨伐，结果师出无功，也是一证，见光武帝纪。另一面，马援前征交阯，对付蛮夷，富有经验，也是光武深知的。

㉘史称宗均矫制后曾上书自劾。也可能汉光武先收到此自劾书，后收到梁松报告。参《后汉书·宋（宗）均传》。

㉙《后汉书·马援传》梁松驿责马援，“因代监军”一句，含义不明。是指代马援总统全军，还是指代宗均为监军。如是前者，则有疑点。梁松虽挂名虎贲中郎将，实乃公子哥儿，从没打过仗，而讨伐武陵蛮夷，是连宿将刘尚、马成等都或败亡，或无功的，精明的汉光武能放心地把指挥全军大权交他吗？如果说汉光武原来意图是：一面驿责马援，一面仍令其继续总统全军，而由梁松替代不太可靠的宗均，在军中起监督、执法作用，可能性似乎更大些。可是如果这样，为什么以后又出现宗均以监军身分矫制招降蛮夷之事，当时梁松到哪里去了？由此可见，只有一种解释，即宗均矫制在前，梁松到来在后，梁松是代宗均为监军，故宗均要立即单独北返，梁松则留在军中收集马援罪行材料。

㉚汉光武只要功臣听话、忠心，不甚禁战争虏掠财物。见《后汉书》梁忠传、桓谭传。

㉛以上分别见《后汉书》皇后纪上和宗均传。

㉜《读通鉴论》卷六“光武”三十四。

㉝因为除掉造的明珠之谮，没有任何史料记载马援在战争中有虏掠贪利行为，相反的倒称他将光武赏赐“尽班诸宾客”，见《后汉书》本传。

㉞《后汉纪》卷八。范晔《马援传》论，基调相同。

㉟《后汉书·马武传》集解引“王补曰”，以为马武两次陷害马援也是“护功诬善”。其实，梁松驿责，马援病卒，已无功可言。马武的陷害当系根据梁松带来信息，迎合光武之意，尽管二人实际上并未探得光武深层次意图。

㊱参《后汉书·马援传》集解引宋人胡寅语，中有“帝……得非春秋既高，智有所困邪”。

㊲错误过去已不同程度存在。如邓禹、贾复等方三、四十岁便被搁置一边，“阖门养威重”，才干遭埋没。

㊳《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七年。

㊴《资治通鉴》卷四三建武十五年。

㊵《习学记言》卷二五。

㊶龙伯高，马援同时代人。这两句乃马援诫兄子书中语。

（作者单位　历史系　　责任编辑　华祝）

ABSTRACTS OF MAJOR ARTICLES

Ma Yuan's Tragedy and Emperor Guang Wu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by zhu zongbin

Ma Yuan was a loyal Eastern Han general with meritorious service. Yet during the campaign against the barbarian tribes of Wuling, he was framed up and wrongfully condemned. Soon after his death, his family was deprived of the ducal seal of Xinxi, and his wife was imprisoned. It seems that he was victim of his personal enemies, but in fact, his death was caused by Emperor Guang Wu's suspicion and narrow-mindedness. Ma Yuan's tragedy lies in the fact that his ideal of being a loyal subject and his heroic deeds in defending the frontiers were both circumscribed by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Emperor Guang Wu's suspicious mind.

On the Forma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Hierarchical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by Deng Xiaonan

Hierarchy played a special role in the selection of official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As the main content of "qualifications," hierarchy formed the criterion for new official assignments and commissions. The hierarchical system, developed from the selection systems of the previous dynasties, consists of two aspects. a sequenc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official positions; and the respective terms in office. The system had been maintained throughout the Song Dynasty, with the appointment of officials revolving around this hierarchical axis, which functioned as a means of adjustment and of restriction.

Thirteenth-and Fourteenth-Century Ruins of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Zhangye River Valley

by Su Bai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century ruins of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Zhangye River Valley. They are: 1) The ruins of the Yuan Dynasty city of Yijinai (the present Ejina Banner of Inner Mongolia)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Zhangye River Valley and the surrounding ruins; 2) The ruins of Ma Ti Si Temple in southern Gansu which i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Zhangye River. With reference to the ruins of Ming Dynasty Tibetan Buddhism,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hypothesis about the origins of certain Tibetan Buddhist temples in the regions of Gansu and Qinghai before the spreading of the 'dge-lugs-pa' order.

The Draft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Budgets in Early Tang Period

by Li Jinxiu

The draft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budgets were major events in the